



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

WEIWUSHIGUAN YU DANGDAI LISHIZHUYI

焦佩锋 著



人民出版社



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

WEIWUSHIGUAN YU DANGDAI LISHIZHUYI

焦佩锋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孔 欢

封面设计：吴燕妮

责任校对：史伟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 / 焦佩锋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20373-7

I. ①唯… II. ①焦… III. ①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5521 号

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

WEIWUSHIGUAN YU DANGDAI LISHIZHUYI

焦佩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7.75

字数：360 千字

ISBN 978-7-01-020373-7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容简介

本书对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启蒙自身的悖反性为切入点，揭示现代性内部的否定之否定关系，以此作为讨论理性和历史关系的思想背景；以古典历史主义和当代历史主义之间的脉络为线索，揭示历史主义从诞生到发展的演化过程，以此作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问题背景；以唯物史观和古典历史主义、当代历史主义的两次对话为重点，揭示唯物史观对历史主义以及作为其相关形式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批判性意义，以此彰显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和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

焦佩锋,男,陕西省彬县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教授,马哲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历史思想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主持并完成省部级课题3项。出版个人专著2部,主编、参编各类教材著作15本。已在《哲学研究》《教学与研究》《光明日报》等期刊和报纸发表文章4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责任编辑:孔欢

封面设计:吴燕妮
QQ38930040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关系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
本书受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项目的资助

序

焦佩锋博士即将出版新著《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邀我作一序。接近年底事情总是比较多，以至于不能细读著作。好在我自己就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清楚焦佩锋的研究意图，不妨谈一点自己的研究体会。

这一课题的意义不言而喻。唯物史观对当代历史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已经构成唯物史观同整个当代社会科学展开对话的基本前提，但这一工作的难度非常大。

其一是课题的把握问题。同传统的历史主义相比，历史主义的当代视域一下子变得十分宏阔，历史主义的自我定位也各不相同，有的是自我肯定，有的则是对历史主义的否评，其间谱系十分复杂，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梳理。而且，这里面的误解亦多，一些研究（包括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对历史主义就存在较多误解。有的研究无视当代历史主义同自由主义现代转变的关联，有的研究把历史主义依然看成是观念论传统及其保守主义在当代的直接延伸，因而不可能把握何以历史主义已经成为诸多人文社会科学未经反思的理论前提。当然，也还存在一种波普尔式的曲解，即在将历史主义看成是同传统的历史主义本来大相径庭的单一进化论模式的同时，将唯物史观本身也看成是历史主义之典型。

其二是传统历史主义与当代历史主义之间的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以唯物史观的形成为界，似乎存在着一种历史法学派

及其历史主义与现当代历史主义的区分，但是，这个分界点是否成立，仍需要讨论。相比于兰克与黑格尔在史学传统中的巨大影响，将历史法学派确定为传统历史主义的样本显然很成问题；若将兰克和黑格尔同时视为历史主义传统，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未必属于历史主义，此外，兰克的史学也未必与历史法学派是同一路向。另外，当代历史主义应当以历史建构传统之确立而为界，但如此界定，实际上又会模糊掉唯物史观对当代历史主义的批判视域。至于那些构成现当代历史主义的人物及其派别，它们其实未必都坚持某种确定的传统与当代之区分。如果只以编年史而区分传统与当代，那么理论内涵性质的讨论意义就要大打折扣。足可见此问题的庞杂性。

其三是如何把握唯物史观。这可能是最大的难题。尽管经过晚年恩格斯的更正，在唯物史观及其研究传统中已很难将唯物史观简化为经济决定论。但是，在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中，唯物史观都是经济决定论的代名词（就此而言，波普尔将唯物史观看作典型的历史主义似乎也不无道理）。我以为，应从如下三个维度把握唯物史观：一是作为历史动力结构的维度。在那里，在对历史结构进行分析时，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统一的生产方式，不能简单还原为单一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通向交往方式。二是批判的或方法的维度。对物的关系的批判必须转化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是同现代性的本质批判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关联在一起。三是目的论的维度，这就是人类解放。但人类解放不能先在地给出，其本身是人的历史性生成过程。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唯物史观，才有可能对当代历史主义展开较为深入的批判，并开放和巩固唯物史观的当代优越性。很遗憾，就当代历史学及其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唯物史观依然被视为某种外部的理论或方法。

因此，焦佩锋选取这一课题，的确是迎难而上。单就唯物史观的发生史而言，的确存在着马克思对当时历史法学派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批判，

这一批判，加上马克思 1843 年对黑格尔抽象的国家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从观念论或唯心主义历史观走向基于社会存在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而且，相对于对马克思有关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研究而言，我们对马克思有关历史法学派及其历史主义的批判的重视依然不够。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显然要更加重要，那里有着马克思将理论重心决定性地转入市民社会即物质生活方式的生产。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法学派及其历史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自己可能还沉浸在“浪漫主义的神圣光辉”而没有进入现代世界，因而就还没有形成其从容展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地平。不过，总的说来，从唯物史观的发生史上展开对历史法学派及其历史主义的批判是比较容易做的，有文本，也有当时真实的思想状况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焦佩锋在 2013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就是从上述角度展开分析的。在博士论文付印之后，我就向其提出，当代历史主义的谱系还需进一步梳理，并将其纳入唯物史观的当代批判视域进行整体研究。如前所述，这一工作难度甚大。焦佩锋博士毕业工作以后，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现在形成的这部著作即是初步成果。面对复杂的当代历史主义谱系，本书采取了一种相对可靠的路数，即不管历史主义本身如何繁杂，但依然可以以世界史所谓古典、近代以及当代这样一个区分，将历史主义分为古典、近代以及当代三个大的分野。在古典历史与近代历史主义的清理与批判性分析方面，本书显然拓展和深化了其博士论文。作者注重于揭示和梳理历史主义以及当代历史主义之复杂谱系，并从如下三条主线进行了把握：第一条主线是启蒙与反启蒙的对峙和争执，旨在突出历史主义产生的思想史和问题史背景，旨在突出 18 世纪以来纯粹理性与历史理性之间的纠葛与矛盾；第二条主线是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的互释和对抗，旨在突出 19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学术传统，并在此传统中彰显德国和英法之间学术传统的差异，揭示和分析从批判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历史哲学之转化；第三条主线

是历史主义以及作为其基本形式的历史意识、历史理论、史学观点和史学理论的演化谱系，旨在剖析使近当代历史主义得以延展的学科谱系和知识体系。从本书的逻辑架构和论述过程来看，这三条主线抓得不错，思路清晰、豁然贯通，资源运用得当。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提炼出唯物史观之结构化、主体化以及实践化，在展开唯物史观对当代历史主义批判视域时，深入到对唯物史观之当代性的领会与把握，其所形成的结论是公允且有一定的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理论史的训练，特别有益于形成较为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哲学史思想史的基础，这使得学者在分析现实问题时，既有较为宏富和开阔的历史视野，也不会为眼前过多的表象所惑，能够有利于研究者抓住社会现实的本质。今天正在展开的辉煌卓越而又仍然面临艰巨挑战的中国道路，本身就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道路在世界历史方向上的创造性展开，因而做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功课，本身就是深入理解中国道路的内在要求。最近这10多年来，我们会同国内一批学人，在既有的研究传统及其基础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理论史的研究。我自己身体力行，也培育了一批优质的博士论文，推出了一套“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形成了一个相互分享、相得益彰的青年同仁群体，焦佩锋是这支队伍的重要成员。近些年来，因其所在单位的责任及需要，焦佩锋也自觉地展开一些时政理论方面的研究与诠释，成果较为丰硕而精彩，依我看来，扎实的理论素养本身就是时政理论研究的基础。也希望焦佩锋继续努力，在学术理论与阐释时代精神的道路上探索前行，取得更大的成就。

邹诗鹏

2018年11月10日于复旦光华楼

前 言

1. 问题的展开

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关系已经是个“老问题”，用历史主义来界定唯物史观或者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历史主义已经是学界的惯常做法，但是，从思想史——尤其是历史意识和历史理论——的视野来分析这二者的关系却是个“新问题”。这是因为，在一种扩大化了的学术视野中，思想史研究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向。基于这一方向，马克思的思想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列宁所谓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而是需要从启蒙以来的思想传统中去发掘使唯物史观得以可能的其他思想资源。在此问题域，19世纪在德国颇为流行的历史主义思潮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更新和补充马克思当年所遭遇到的社会思潮，马克思对德国历史主义诸学派始终持批判态度，对这种学术交往史的清理和梳理本身就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历史主义的伴生物，马克思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主要源于他对历史主义的保守化立场和唯心主义实质的不满。经由这种批判，马克思重新表达了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独到理解，唯物史观便是这种理解的理论形式。质言之，历史主义构成了唯物史观创立的“前史”。

在2013年出版的《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一书中，我们对唯物史观

与历史主义的这种思想关联做了一些基础性清理和原则性比较。具体是：(1) 清理了德国历史主义兴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2) 明确了马克思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定位和态度；(3) 辨明了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原则性差异；(4) 对当代历史主义（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及其问题进行了分析。现在看来，这本书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是：(1) 就问题而言，它只是铺开了问题，其更多聚焦的是历史主义对于唯物史观的发生学意义，缺乏对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问题链研究；(2) 就时段而言，它对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的解读主要局限于 18 世纪、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叶，缺乏对启蒙以来的当代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理论的系统梳理；(3) 就国别而言，它对德国和法国的历史观念和著作的阐述较多，而缺乏对英美等国的历史思想的研究。所以，“主题不深、时段不长、范围不宽”是《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一书的局限所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将问题拓展为“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的关系研究，它实际上是对原有研究的补充、丰富和深化。

2. 问题的谱系

实际上，国外学界对历史主义的多样性研究是促成我们深化研究这一问题的背景。大致而言，西方学界对历史主义问题的研究路向主要是：(1) 语义学的角度，这主要是从语义学和历史认识论角度解释历史主义概念（Dwight E. Lee, Robert N. Beck, 1954；K. Mannheim, 1970；Karel Kosik, 1977；Iggers, 1995）；(2) 思想史的角度，这主要是结合启蒙语境揭示历史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及其积极的认识论意义，同时，肯定其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思想和理论意义（Leo Strauss, 1953；F. H. Heinemann, 1946；Helen P. Liebel, 1971；Colin T. Loader, 1976；克罗齐，2005；伊格尔斯，2006；卡洛·安东尼，2010）；(3) 问题史的角度，这主要是对历史主义兴起的积极意义和内在危机进行梳理（Ernst Troeltsch, 1922；Karl Heussi,

1932 ; F. Meinecke, 1972) ; (4) 史学理论的角度, 这主要是强调历史主义对历史科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Heinrich Cunow, 1920 ; E. P. 汤普森, 1972 ; 科恩, 1978 ; 霍布斯鲍姆, 1984 ; S. H. Rigby, 1987)。

若集中到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关系, 国外的研究路向主要是: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结构历史主义, 但是其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并不具有真理性 (Fredric Jameson, 1979) ;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借助物质生活观、群众史观、阶级结构观克服了历史主义的困境,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 其很难介入主流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领域, 且已不能解释当代社会 (巴勒克拉夫, 1987) ; 有的学者从肯定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一元论的历史主义 (葛兰西, 1990) ;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历史主义 (曼海姆, 2002) ;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反对历史主义 (雷蒙·阿隆, 1998) ; 波普尔则在将历史主义视为历史决定论的前提下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被批判 (《历史主义贫困论》, 1957)。值得关注的是, 法国史学家雷蒙·阿隆曾基于西方历史思想史的维度对马克思与历史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颇多深入研究, 其很多研究结论和立场与本人既有的研究结果有诸多契合之处。当然, 我们也看到, 这种研究更多是从史学理论层面所进行的一种总体性阐发, 他关注的更多是“历史怎么写”, 而不是“历史是什么”, 而创新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更不是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总体而言, 国外学界对历史主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 一个是理论层面, 主要是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层面对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和方法论原则进行阐释; 一个是现实层面, 主要是结合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对历史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和观念论进行阐释。但是, 其局限性也很明显, 那就是将其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 仅有的一些研究也不乏意识形态偏见, 甚至存在对马克思和历史主义的双重误解, 因此, 从近当代西方历史思想史的角度系统梳理唯物史观与历史

主义的关系很有必要。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国内学人就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基于这一“主义”而可能的历史本体论、历史动力论、历史结构论、历史形态论和历史趋势论进行全面解读，这种研究不仅在根本上巩固了马克思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理论，而且对毛泽东历史观的塑造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都有不容小觑的意义。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历史主义不仅是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更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和历史存在论，前一种意义较好理解和传播，而后一种意义并未得到重视和辩护。更为重要的是，真正提出历史主义概念并据此展开与唯物史观关系的讨论则是解放以后的事情，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历史主义问题的提出（20世纪50—60年代）。在此阶段，国内主要围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学术资源和学术眼界的制约，这场争论掺杂了过量的政治因素，使得“历史主义”在当时被贴上了“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的标签。因此，当时的中国学界不仅很难对历史主义的来源和谱系展开实质性研究，而且也不可能在冷静、平等和理性的氛围中分析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此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可以参见蒋大椿编著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和王学典所著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两部著作。

第二阶段：历史主义研究的深化（1978年至今）。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而且也拉开了中国学术繁荣发展的序幕。在思想大解放氛围的促动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对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整体反思，这当然包括对“推广论”“阶级斗争论”“历史决定论”等关乎唯物史观本质的诸多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现当代的哲学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认可和理解，于是，在以问题意识为带动的诸多部门哲学的簇拥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视、重释乃至重构变成了新的学术方向。在此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问题、生产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问题等都被中国学界重新关注和讨论。

在此过程中，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也被重新提及和讨论。其研究路向主要是：（1）立足史学理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蒋大椿，1996；于沛，2009；张广智，2008；陈其泰，2011；侯树栋，2012）；（2）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根基（王新生，2008、2009）；（3）研究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哲学来源（张汝伦，2000）；（4）考察历史主义自身的谱系和实质（李工真，2002；陈新，2007）；（5）从马克思主义内部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内涵及特点”（俞吾金，2007；王南湜，2008；沈湘平，2010；邹平林，2010；张盾，2010；沈江平，2011；林伟，2012）；（6）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研究马克思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黄继锋，1994；唐正东，2003；胡大平，2011）；（7）从思想史角度研究马克思与历史主义关系，阐述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尚处起步阶段（赵士发，2007；邹诗鹏，2008、2011、2012；袁祖社，2010、2012；韩志伟，2011；宋友文，2011、2012）。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者宋友文的《历史主义与现代价值危机》一书的写作和出版时间与本人的《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大致同步。较为不同的是，《历史主义与现代价值危机》一书更多侧重于价值论路向，其主要分析的是历史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关系，其对当代西方历史

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思想史走向和研究略有不足，这便是我们深化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问题研究的基本理由。

综合可见，中西学界对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我们分析，或许是受指导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哲学界和史学界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与历史主义关系的研究难以深化，所以，仅有的一些研究也是从一般的历史认识论出发将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笼统关联，缺乏深度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相形之下，国内的情形较好于国外，近年逐渐走热的思想史思潮是深化本书研究的学术背景，但问题在于：（1）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刚刚开始，很多研究还停留在原则层面和起步阶段。（2）缺乏对历史主义产生的思想和现实背景的系统梳理，各种对“历史主义”概念的误解和误用便是其结果，有的学者所理解的历史主义更多是一种朴素的历史认识论，有的学者甚至依然坚持 60 年代的历史主义概念，更有甚者将历史主义等同于历史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这似乎脱离了历史主义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语境。（3）从历史思想史角度研究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关系还尚未形成共识，尤其是回到西方历史思想史的谱系之中，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以历史理论为标尺对历史主义的走向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还显得较为单薄。正是因此，本书力求将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关系推向前进，以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处境和意义做些深入探讨。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需要特别交代，那就是：历史主义代表了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和改版，如果仅从理论意义或者思想意识的走向研究历史主义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德国历史主义自始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目的论，这种历史目的论在分崩离析的 19 世纪对于凝聚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抵抗法国的文化侵略，实现德国的统一很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统一之后，在助长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历史主义并没有止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德国既是战争的发起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此过程中，整

个德意志知识界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消退，很多史学家依然在用德意志历史的特殊性为德国的遭遇进行辩护。有的历史主义者甚至认为，纳粹主义并不是德国一家的事情，而是欧洲理性主义文明本身的灾祸，被誉为“最后一位历史主义大师”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复杂的思想斗争就是这一点的充分证明。更为关键的是，在梅尼克之后，德国的知识界乃至欧美学界对此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从当代历史理论的谱系中清理和批判历史主义就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3. 问题的意义

如果说《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代表了一种基础性研究，这种研究较为系统地清理了德国历史主义对法国理性主义的某种思想意识层面的批判、矫正和转化，而且我们也在尽最大努力在历史主义自身的谱系中对纳粹主义问题进行揭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历史主义究竟是德国的事情，还是欧洲文明本身的事情？因而，问题的提法必然是：如果说《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更多强调了（而且也必须强调）历史主义问题的由来、马克思对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主义问题的本质和走向、历史主义的当代意义等基本方面，那么《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就需要结合当代西方思想史（尤其是“二战”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做更为深入的讨论，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

十分明显，本人5年前撰写的《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对于当代历史主义的研究显然不足，一方面，它更多是一种“是其所是”的研究，其对历史主义的定位更多是在反启蒙的意义上展开，在兼顾相当程度的学理分量的同时，特别是对历史主义的现实目的和影响分析不够，而这恰恰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它缺乏对当代历史思想史的梳理，很多当代历史理论家、史学理论家的观点和论断并未进入这一问题域。比如，解释学史学对传统历史观念的挑战和影响；历史决定论对唯物史观的调整与回